

POETRY
EXPLORATION

诗探索

2003年3—4辑 总第51—52辑

- 陆耀东 关于冯至研究的对话
任洪渊 《白色花》后的牛汉诗
金索贤 [韩国] 超越生的极限
牛 汉 我仍在跋涉
北 坡 孤立之境——读北岛的诗
谭五昌 世纪之交的中国新诗状况：1999—2002年
罗振亚 亚文化选择：民刊策略与边缘立场
沈 健 从思想的人到物质的人
叶 范 不仅仅是一代人
张同吾 绿色家园与天堂玫瑰
金元浦 神的故乡鹰在言语
熊 辉 九叶诗派艺术研究的拓展
李 丹 余光中与佛洛斯特比较谈
柯 雷 [荷兰] 非字面意义：西川的明确诗观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诗 探 索

2003年第3—4辑 总第51—52辑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诗探索. 2003年. 第3~4辑 / 谢冕, 杨匡汉, 吴思敬主编. —天津: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3.10
ISBN 7-80688-062-3

I . 诗... II . ①谢... ②杨... ③吴... III . 诗歌—文学研究—中国—丛刊 IV . I207.22-5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3) 第112152号

出版发行: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地 址: 天津市南开区迎水道7号

邮 编: 300191

电话/传真: (022) 23366354

(022) 23075309

电子信箱: tssap@public.tpt.tj.cn

印 刷: 天津铁路分局天津印刷厂

开 本: 889×1230 毫米 1/32

印 张: 10.5

字 数: 290 千字

版 次: 2003年12月第1版 2003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2000 册

定 价: 20.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冯至研究

- 关于冯至研究的对话/陆耀东 1
《十四行集》版本小考/刘 勇 15
浅析冯至对十四行诗做出的民族化探索/陈小凡 21
人格的形成:时代、山水和神性/杨 志 29
——论冯至中期文学观念的核心
《伍子胥》/王 彦 张 岩 39
——一首低抑动人的诗
新时期冯至诗歌研究综述/杨汤琛 47

牛汉诗歌创作研讨会论文选辑

- 《白色花》后的牛汉诗/任洪渊 64
生命的诗与诗的生命/苗雨时 67
——试论牛汉诗歌创作的现代性
游牧与梦游/姜玉琴 70
——牛汉诗歌的艺术风格
抒情的牢笼/荣光启 81
——牛汉诗歌创作内在的问题及求索
隐显在字里行间的“马”/陆 健 95
——牛汉诗歌作品意象谈
从《二分硬币》到《花灭了,花是灯》/[韩国]金龙云 100
超越生的极限/[韩国]金素贤 113
——牛汉“文革”时期诗歌研究

我仍在跋涉/牛 汉 132
——在“牛汉诗歌创作研讨会”结束时的答谢辞
诗品与人品的双重魅力/杨志学 136
——“牛汉诗歌创作研讨会”综述

关于北岛

孤立之境/一 平 144
——读北岛的诗
“我一直在写作中寻找方向”/唐晓渡 北 岛 164
——北岛访谈录
北岛诗二首解读/杨立华 173

诗坛态势剖析

世纪之交的中国新诗状况:1999~2002年/谭五昌 184
亚文化选择:民刊策略与边缘立场/罗振亚 205
从思想的人到物质的人/沈 健 215
——论二十年来诗歌个人反抗主题的嬗变

新诗文本细读

不仅仅是一代人/叶 苗 228
——《一代人》:一个20世纪80年代生人的解读

地域诗歌研究

20世纪重庆新诗的发展轮廓/吕 进 232
——《20世纪重庆新诗发展史》导言

姿态与尺度

“老顽童”的诗美追求/徐瑞哲 242

诗情与智慧的熔铸/谭旭东 杨汤琛 251

——高洪波诗歌论

荒林:与谁交谈? /杨远宏 259

绿色家园与天堂玫瑰/张同吾 264

——读海田的诗

诗人谈诗

诗美断想/晓 雪 267

窥诗手记/向 明 275

诗歌理论著作评介

为混乱理出秩序/师力斌 282

——读《秩序的生长——后朦胧诗文化诗学研究》

神的故乡鹰在言语/金元浦 286

九叶诗派艺术研究的拓展/熊 辉 292

——读蒋登科《九叶诗派的合璧艺术》

中外诗歌比较研究

余光中与佛洛斯特比较谈/李 丹 296

外国诗论译丛

非字面意义:西川的明确诗观/[荷兰]柯 雷著 张晓红译 305

关于冯至研究的对话

陆耀东

从 20 世纪 80 年代初起,我一直在研究诗人、学者冯至先生,并接受北京出版社文艺部(今为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的邀约撰写《冯至传》。二十年后,去年末方交稿。今书即将面世,特将近二十年来与认识和不认识的朋友的对话,整理出来,公之与众,愿更多的朋友有以教我。

问:请谈谈对有关作家、学者传记著作的看法。

答:新时期以来,已出版有关中国作家、学者的传记二百余种,写法多样,有重传主论著的,也有重传主生活道路和思想演变的;有带有文艺创作色彩的,有将其视为学术著作,无一字无来历者;有除写传主外,其周围人物则往往只写其与传主有关部分,其余则从略,也有将传主有关人物,一一介绍;有的侧重历史感,有的侧重当代感……非常多样,各有所长,读者也各有所爱。

至于我个人,由于职业是教书和学术研究,自己在作家、学者传记撰写中,特别重视传主的论著,以此为轴心。传记著作必然要写传主的家庭、生平、思想历程,但不是凡事皆记,而是择其要者,即与传主的个性、思想、生活、论著有密切关系者。我写《冯至传》,想走冯至写《杜甫传》“以杜写杜”的路子。材料的提供,冯先生的女公子冯姚平给了很多帮助,如:《天津亦政堂冯氏本支家谱》,要是她不提供,我是无法找到的。

问:冯至的论著,部分后来做了改动,你是怎样对待的?

答：这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是一个常见的现象。对作家后来的改动，我们应该理解。须知，这是作家的权利；同时这也可能是由于某种压力。初版本和后来修改过的版本，各个反映了写作时或修改时作家的思想及其社会环境。因此，我坚持用初版本，如果引用后来修改过的版本，那也只是为了说明作者后来思想的变化（包括审美情趣的变异）。

问：能否请您介绍一下冯至的个性？

答：冯至性格内向；话语不多但又不是沉默寡言；情感热烈、深沉，不大外露；谦虚近于自卑，但始终有上进心；谨慎，貌似软弱实则有所坚持，属于外柔内刚一类。有人说冯至一定是一个很厉害的人，所以能制服锋芒毕露的姚可崑女士。针对这种判断，姚说：

……既不是他有什么“厉害”，也不是我被“制服”，可能是他的性格里有点“柔”，说我“锋芒”，也许是他的性格里有些“刚”，要说“制服”，那就是“刚”被“柔”克服了。所以每逢一件小事需要决断时，两人意见不同，最后总是他做最后的决定。我常向他说：“我的意见是宣言，你的意见是圣旨；宣言长篇大论，未必实行，圣旨只有一两句话，就得遵命。”^①

从我和冯至的接触中，我觉得他为别人着想多于和超过为自己着想。这是一种品质，也是他性格的一个组成部分。

问：您将冯至主要是作为诗人还是作为学者来写的？

答：我认为，冯至是20世纪中国最杰出的几位诗人之一，同时，又是中国最杰出的两三位德语文学研究专家和杜甫研究专家之一。附带说明一点，我是将他的《杜甫传》，视为学术著作，但也不否认它是传记文学。

问：请就冯至诗，谈谈您的看法。

答：关于冯至的诗，我分为四个阶段加以论述。对他早期的诗包括收进《昨日之歌》和未收进这个诗集的诗的分析，我以《论冯至早期的诗》为题发表在《长江学术》第二辑上。我认为，冯至这时的诗，有两点为

^① 姚可崑：《我与冯至》，广西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13页。

同时代诗人所不及：一是如《蛇》、《我是一条小河》、《怀 Y 兄》、《在郊原》这样一些抒情诗中的绝唱；二是贡献了《吹箫人的故事》、《绣帷幔的少尼》、《蚕马》、《寺门之前》四首当年罕见的优美的叙事长诗。

《北游及其他》是第二阶段。冯至自己和不少研究者认为：作者两年后（1929年）出版的《北游及其他》是《昨日之歌》的进展和提高。这不能说没有根据，诗人的视野较前开阔，认识深度也较前更进一步。但作为诗，抒情诗未能超越《蛇》、《我是一条小河》、《在郊原》等，更没有杰出的叙事诗出现。所以对这两部诗集的评价，应做具体分析。

《十四行集》是诗人诗创作的高峰，也是中国现代诗的高峰之一。有分量有深度的研究成果，如解志熙的论著对此诗集所受存在主义影响做了相当充分分析。^① 我觉得，《十四行集》除受歌德、里尔克、诺瓦利斯的影响外，思维方式有些和中国传统的思路相近似，最主要的是以博大的胸怀，同情穷苦人和普通人；在艰苦的环境中，在黑暗的日子里，在险恶的危机前，仍向往光明，期望奋力前行，不消极悲观，不颓唐退缩，不怨天尤人。这一方面，使人隐约感到，冯至在深受欧洲哲学影响的同时，也承继了屈原、李白、杜甫、曹雪芹、吴敬梓等的中国文化传统。

问：请剖析、评价一下冯至建国后的新诗，因为这些诗作存在的问题，在1949年前即成名的诗人来说，具有普遍性。

答：冯至17年的诗，是他写诗的第四个阶段的产品。诗集有《西郊集》和《十年诗抄》。^② 其中的诗，几乎都是因“时事”而作。作者说：

这些诗在质量上也是粗糙的，但是比起我建国前的诗，我是走上了正确的道路，这道路不是旁的，就是一切为了人民，不是为了自己。^③

这是需要辨析的。但我想只要先检阅一下这两个诗集的作品，问题就会迎刃而解。《西郊集》分四辑，第一辑《我们的西郊》，赞扬新中国的建设和变化。如：《我们的西郊》，从新旧社会对比中歌颂花一样的现实，

^① 解志熙：《生的执著——存在主义与中国现代文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

^② 《十年诗抄》有45首选自《西郊集》，只有5首1958、1959年的新作。

^③ 《西郊集·后记》。

中间四节分别写妇女衣裳的变化，公园由冷清到沸腾着欢声，公路的延伸和拓展，诗人幻想成真，最后一节写道：

我们却从这天天生长的西郊，
看到了祖国从首都到边疆
在千千万万劳动者的手里
转变成幸福的地上的天堂。

诗人抒写的事物是真实的，诗人的情感和感觉也是真实的，并不矫揉造作，但失于肤浅和一般化。《歌颂鞍钢》共六节，分别写“为了许多愿望”，“为了许多幸福”，“为了一句名言”，“为了许多模范”，“为了许多奇景”，“为了持久和平”，有概括力，但不免有概念化之嫌。《三门峡》写道：

我们用五六年有限的时间，
结束千百年无限的痛苦；
我们用几十年有限的时间，
创造千百年无限的幸福。

且不说诗的内容未超出当时工地宣传人员的介绍^①，即使是展望也有“轻信”和“过实”的毛病。《国庆日游行》不是创造，而是用一些普通的常识和没有个性色彩的语言编织而成：

我们的队伍是勤劳，
我们的队伍是建设；
我们的工作有利于
全世界劳动者的生活。

这里，没有思想的光华，没有诗意的灵动，也没有诗的味道。《登大雁塔》、《半坡村》总是沿着今昔对比的思维方式表现对象，落入了公式化的陷阱。《煤矿区》、《刘家峡之歌》、《戈壁滩》、《在建设中》都有一般化的毛病。这一辑全是写新事物，写建国前后的变化，写建设的新面貌。中国从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到1949年新中国诞生，经历了几十年战争，加之国民党的腐败，不断出现经济危机，建设停滞，人民生活水平下降。

^① 同年7月，我也曾随中南作家代表团在三门峡工地参观访问一个星期，工地宣传人员如此介绍。

新中国成立初年，政策符合实际，经济迅速恢复，党风政风廉洁，干部群众关系较为和谐，国民中绝大多数对共产党、对毛主席、对新政权，都怀着真诚的热爱。诗人们写了大量的颂歌，表达了内心的激动。我们今天不能因历史的隔膜而否定诗人情感的真实性；同时又必须看到，包括冯至先生在内的许多著名诗人发表的这类诗，有些只是诗的素材，最多只是半成品，还不是真正的诗，没有诗意。尚未形成为“诗”，却要以“诗”的面貌出现，便令人怀疑其真实性了。更何况有些连“素材”、半成品也不是，如：《伟大的事业——题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

我们要生产更多的钢铁，
我们要发出更多的电力，
我们要挖出更多的原油、原煤，
我们要制造更多的新机器，
我们要收获更多的食粮，
我们要织出更多的布匹，
我们让高山峻岭阻不住我们的交通，
我们让黄河的河水更清，供我们使用，
我们给社会主义打好物质基础，
让敌人在我们面前垂头丧气。

这诗内容正确，相当全面。生产嘛，工业、农业、交通、水利都提到了；工业嘛，钢铁、电力、石油、煤炭、机器制造、纺织，一个不漏。思维方式，是理论逻辑的思维方式。诗人认识和感情也不假，不是为了逢迎谁，谀媚谁，却把诗写得不像诗了。这种现象，在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的大多数诗人中，是带有普遍性的。

《西郊集》第二辑，除《我的感谢》、《光荣的名称》、《西安赠徐迟》外，全是为劳动模范写照，构思也大体相同，先叙其先进事迹，再写诗人的认识和感情。如对发明了炉里砌隔火墙，不停产修好平炉的潘长有，诗人在最后一节的表态是：

我们为了拯救和平，
要像你那样一切不顾，
我们随时都准备着

跳入炉里高温六百度。

相当生硬，缺少感人的艺术魅力。有些诗，全篇意在“说明”，如：《咏张明山》，只是为了“说明”张明山创造发明的意义，“说明”他“消耗了三年的心血”，不顾“个人的幸福”，为了“压延工人的健康”，“战胜保守和偏见”；最后“说明”：

又一度说明了新中国
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

“说明”很难成为诗，这种思维方式与诗的思维方式相去甚远。没有经过灵魂燃烧或沉埋的创作资源，不过是资源，不是成品；缺乏创获和新的诗的思维，流于一般化的思维，不可能产生饶有生命力的诗。

《西郊集》第三辑是诗人出国访问所作，无感人篇章，第四辑叙事诗《韩波砍柴》和《人皮鼓》堪称不俗之作。《西郊集》的几十首抒情诗和叙事短诗，只有《西安赠徐迟》是真正的诗。

至此，我们不能不面对这位当时已届中年诗人创作中的一个问题——也是当时许多知识分子出身的作家诗人都出现过的一个问题：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低水平的艺术品？

这，既有客观的也有主观的原因。当时，解放区来的作家、诗人，政治上最受优待的是工农兵出身的，其次是知识分子出身的。而在解放区作家与国统区作家之间，前者无形中有优越感，待遇也有区别，如“人民文艺丛书”著者往往只谈经验；而开明书店出版的一套“新文学选集”除已逝世的作家外，大多在《后记》中做自我批评。前者专为解放区作家所设，后者专收国统区作家作品。而国统区作家又分三等，那就是郭沫若先生在第一次文代会上说的：“这个统一战线包含了无产阶级文艺家，小资产阶级的文艺家，资产阶级的文艺家，以及其他一切爱国的新旧文艺人士。”^① 作家人分三等：一等是左翼；二等是中间偏左，三等是中间偏右或划归右派。冯至从1921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到新中国成立，从未和共产党对立过，也从未和革命文艺争论过；他和中国绝大多数正直的知识分子一样，是革命的可靠的天然盟友。新中国成立，他欢欣雀跃，

^① 郭沫若：《为建设新中国的人民文艺而奋斗》。

真诚地高兴；对革命文艺理论，还有些隔膜，但他不怀疑其正确性。他再三地否定自己走过的创作道路，1954年他当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后表态说：“我的心上蒙盖了二十多年的灰尘，我的脑里堆积了二十多年的垃圾，这些灰尘和垃圾必须清除掉，才能做一个新中国的人民。”^①请注意：他这时已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却不敢肯定自己是一个合格的“新中国的人民”。至于诗中对自己过去的否定，不仅是过苛，有些根本不合理。但在当时，冯至确是真诚的自觉的。在诗人当时看来，自己身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只有彻底否定过去，才能以新的姿态走上新的“正确”的路；只有“夹起尾巴做人”，才能不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好独立思考的“毛病”……因此，冯至自觉地坚决地与《十四行集》告别，从诗的高峰回到峰底，和“大众”一起，在平地上，随时准备着，听号令，齐步走。这不是冯至过去的习惯，更非其特长，但他还是竭尽全力歌唱，虽然大多不美不感人，这种心态，在《我的感谢》中表现的很明显：

你让我，一个知识分子
又有了良心。

我的父母把我生下来，
心里就蒙盖了灰尘，

.....

看不见光明，只看黑暗，
分不清朋友和敌人
感不到人类的历史在前进，
把真的掺上了假，
假的掺上了真。

这首写于1952年的诗，除夹有个人崇拜、将领袖神化的因素外，有些夸张到失真的程度。诗人过去还是坚持正义、反对邪恶，追求光明、憎恶黑暗，追求向上、从不堕落，靠拢进步、疏离落后的；并非此前无“良

^① 《冯至全集》第5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366—370页。

心”,并非“把真的掺上了假,假的掺上了真”。在新时期以前,作家、诗人不管是否真有“问题”,只要负责人怀疑,就认为有问题,且不许把原因归于客观,只许从主观上找根源。使得不少诚实的知识分子也以彻底否定自己的过去为“真”。上述作品中存在的问题,不是个别现象,只要翻一翻当时的报刊就可了然。

问:冯至作为德语文学学者的一代宗师,您认为他的主要业绩何在?

答:冯至任北京大学西方语言文学系教授、系主任数十年,即使1970年离开北大后,新时期他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也还在继续指导研究生,培养了许多优秀的学术人才,如今著名的德语文学学者中,大多出自先生门下。这一方面的业绩绝不可低估。在20世纪,中国译介、研究德国文学用力最勤、成果较多当推郭沫若、冯至、沈雁冰、田汉、吴宓、耿济之、郑振铎(西谛)、朱光潜、杨丙辰、李辰冬、赵景深、季羨林、梁实秋、段白莼(段可情)、虚白、郁达夫、唐性天、杨昌溪、梁俊青、梁宗岱、唐小圃、陈铨、陈源、刘思慕、绿原、钱春绮、范大灿、余匡复、高中甫等。冯至在翻译德语文学、论说德语文学方面的成果有:

翻译:

歌德:长篇小说《维廉·麦斯特的学习时代》(与姚可崑合译)

诗47首

(德)俾德曼:《歌德年谱》

席勒:《审美教育书简》(冯至、范大灿合译)

荷尔德林:诗2首

海涅:《海涅诗选》(收诗68首)

《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

《集外诗八首》

散文《哈尔次山游记》

尼采:诗10首

格奥尔格:诗1首

里尔克:《给一个青年诗人的十封信》

诗11首(组)

布莱希特：诗 18 首

冯至研究德语文学的论著丰富，1948 年 8 月曾出版过《歌德论述》一书，1959 年与人合著《德国文学简史》，1985 年 8 月出版了《冯至学术论著自选集》，1986 年出版了《论歌德》。他研究歌德的论文和演讲词达 36 篇。

冯至翻译和研究德语文学的成果，共约一百多万字。翻译最多的是歌德、海涅、里尔克、席勒的诗文，研究对象重点是歌德、诺瓦利斯、里尔克、席勒、尼采等。冯至深知，孤立地研究某国一两个作家，即使是最伟大的作家，也是难以达到高境界的。因此，他由博及深，在广博的基础上建构学术高塔。

在德语文学作家中，冯至最感兴趣和亲切的是里尔克。他在德国留学时，曾准备以里尔克的《马尔特·劳利兹·布里格随笔》作为博士学位论文论题，后因导师阿莱文被解聘，才不得不改作关于诺瓦利斯的。对里尔克，冯至发现和肯定了他的人生哲学，“做人的态度”，他那“心的谦虚”，“忍耐与工作”；他不“伏枥于因袭的传统与习俗之下，而是向着一个整个的‘人’努力”；冯至在给杨晦和德国友人鲍尔的许多信中，把里尔克的著作，视自己灵魂的故乡；将最好的形容词和赞语置于里尔克及其作品，说里尔克“伟大”、“可爱”、“伟大而美”、“丰富”、“广阔”、“真纯”、“认真”、“做人的态度”和“人格与作风都具有意义”，是“不受传统的习俗影响的纯洁的人”；说里尔克的诗、散文、小说都好得很，是理想的诗，理想的散文；诗很美，“融会济慈和波特莱尔的长处”，是“人间精品”，像雕刻一样，“表现的方法，都是独出心裁”。冯至说他阅读或翻译里尔克的作品，是出于“内心的需要”，翻译后者的作品是“同我一部分‘命’一样”；冯至还想用它来改造中国青年的灵魂和中国的国民性。认为自己多方面从里尔克的作品受益，里尔克的诗和散文中的“心的谦虚”，“我解释革命是克服许多恶习而有利于最深的传统”，人必须“忍耐与工作”、“甘于寂寞”，“美是恐怖的开始”等等，这些发现或强调，至少在中国的里尔克研究中，是空前的，而且迄今无人超越的。

冯至深知：如果不理解歌德，就等于不懂得德国文学。但他对歌德开始主要是“敬畏”。1932 年起，对歌德的认识渐深。抗日战争时期，冯

至又一次亲近歌德的作品，并从中汲取精神力量。他说：“这时我阅读《浮士德》，把它看做是一部肯定精神与否定精神相互斗争最后前者取得胜利的历史。浮士德的独白和浮士德与魔鬼的对话给我以极大的启发。那时我用中国古代经典《易经》的一句名言‘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来概括这部巨著：《天上序幕》是‘天行健’的颂歌，‘君子以自强不息’正好形容浮士德的一生。蜕变论是歌德思想里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浮士德从前一阶段痛苦的克服换取了下一阶段的新生。蛇蜕去旧皮才能生长，凤鸟从自焚中获得新的生命，是歌德惯于使用的比喻。在变化多端的战争年代，我经常有抛弃旧我迎来新吾的迫切要求，所以我每逢读到歌德表现蜕变思想的作品，无论是名篇巨著或是短小的诗句，都很有同感。”^①他还总结似的说：

肯定精神、蜕变论、思与行的结合，我在中年时期从歌德的作品中体验最深，获益较多。若是说我青年时读《维特》有如读亲密的友人的书信，那么我在中年读《浮士德》和《威廉·麦斯特》就像是读‘生活的教科书’了。^②

我想补充的是，冯至在建国后思想上经历的“两难”，和“文化革命”中的陷入绝境，拯救他的精神力量除马克思主义外，恐怕也有歌德的一份。

作为德语文学的杰出学者和歌德研究专家的冯至，他的独特贡献是多方面的。

引导中国的德语文学研究。新中国成立后的前十七年，冯至担任北大西语系主任，此外，在中国作家协会、人民文学出版社等单位兼职，只有系主任在系内有些实权，其他则仅有建议权。对德语文学研究，他难以超越上级规定的方针、政策、原则，个人创造性发挥的空间很有限。“文革”后，他提出了一条重要的原则，1985年，他说：

……我们不能把歌德在18世纪对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态度如何，像我们在20世纪以是否赞成俄国社会主义为标准那样，来

^① 《冯至全集》第5卷，第219、220页。

^② 《冯至全集》第5卷，第220页。

评定他是进步的或反动的。^①

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段，我们习惯于简单化的机械的思维，评价一个历史上的伟人，只看他对革命的态度如何。冯至敢于纠正这一偏向，表现了他的理论创新勇气和建树。他以歌德为例，说：“作为一个伟大的诗人和思想家……他气势磅礴，包罗万象，好像咀嚼了全世界文化的精华，敢于向与莱卜尼茨同时代的科学泰斗牛顿挑战（虽然他的颜色学理论是错误的），钦佩富于反抗精神的拜伦；他自认为从英国剧作家兼诗人莎士比亚、荷兰的哲学家斯宾诺莎、瑞典的自然科学家林奈得到无限的教益；他旅行瑞士和意大利，称赞新建立的美利坚合众国，神游于波斯、阿拉伯的原野，对远方的中国也有一定的理解。他永无厌倦地在精神世界里翱翔，创作出许多名篇巨著，这功绩在人类历史上是不能泯灭的。”^②这样伟大的诗人和思想家，不能因为仅仅他反对法国大革命而将他定性为反动人物。冯至的这一见解，对我们的文学研究，有着“拨乱反正”的作用。

对外国文学研究，冯至主张“应当对外国的社会历史、思想渊源和精神气质以及科学技术发展能有一定程度的了解”；“不仅要研究作家、作品，还要了解与此关系密切的各种思潮”^③。他不仅在方法论上，提出了中肯的意见，而且还在歌德研究、里尔克研究、诺瓦利斯研究中联系当时的生物学、物理学、化学等自然科学的新发现，探寻他们的一些社会观念的渊源。当论及诺瓦利斯“类比性”的偏向的时候，说：

当我们看到诺瓦利斯经常拿嘴巴与眼睛、睫毛与嘴唇、额头与鼻子、大脑与睾丸类比时，就觉得他好像骑着一匹骏马，任凭组合“一切的联想和变化、融合一切”的想象向着类比性纵横驰骋——当时的自然科学现象，诸如氧和电流的发现、磁性和化学中的亲和力也有助于诺瓦利斯把一切都加以对比和同化、排列和混合、联系

① 《冯至全集》第8卷，第13页。

② 《冯至全集》第8卷，第15页。

③ 《冯至全集》第5卷，第446、447页。